千年回眸 古渠春秋

秦渠：岁月流转两千秋 一渠活水润古今

作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宁夏引黄古灌区，自秦代屯垦开渠以来已有2200年的历史，历经汉唐开发、元代复浚、明清扩建，渠系逐步完善。目前，宁夏现存历史超过百年的古渠共有14条，包括秦渠、汉渠、汉延渠、唐徕渠、东干渠、西干渠、惠农渠、大清渠、泰民渠、七星渠、美利渠、跃进渠、羚羊寿渠、羚羊角渠，总长度1346公里。密如蛛网的古渠与现代水利工程相融共生，滋养着塞上江南的千里沃野。截至目前，宁夏引黄灌区总灌溉面积达1080万亩，高效节水灌溉覆盖率超60%。

即日起，本报“千年回眸 古渠春秋”栏目，聚焦宁夏引黄古灌区14条古渠的历史沿革、工程特点及灌溉现状，追溯千年水利脉络，记录古渠当代价值。

兼具灌溉与城市生态功能的“活遗产”——秦渠。（**图片由自治区水利厅提供**）

秦渠又名秦家渠，与七级渠有因果沿革关系。原开口于黄河青铜峡出口东岸，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七级渠之名最早见于唐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秦家渠之名始见于元大德七年（1303年），《虞集翰林学士承旨董工行状》记载：“开唐徕、汉延、秦家等渠”。明嘉靖《宁夏新志》卷三，灵州水利记载：“秦家渠，古渠名也”。

秦渠的维修整治始见于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年）监察御史周弘礿将河东秦、汉二坝，依河西汉、唐坝筑以石。后因渠口进水不利，巡抚崔景荣以石砌成，水始流通，灌田900余顷。天启三年（1623年）河东道张九德于渠口下筑长堤数百丈，逼水中流，并于长堤下数里修猪嘴码头（挑水坝），免除了河水对秦渠口及口下20余里渠道的威胁。清康熙时参将李山将进水闸砌以石底，岁省夫料甚多。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改汉渠废口为上口，原口为下口，至此秦渠有上下两口，进水始得充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灵州知州陈必淮修复猪嘴码头，以石堆砌，宽18丈、长80余丈，斜插河中，使河水复归古道。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河水冲决秦渠细腰子拜，省建设厅组织修复，两月竣工未误冬灌。

到解放前，秦渠由峡口北流经金积县，至灵武县北门外，尾水入涝河（今山水沟），渠道全长71.5公里，有大小支渠220余条，木质桥梁28座，灌田14.5万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至1952年由宁夏水利局勘测设计，河东工程处施工，自秦渠郭家桥建闸分水，新开支干渠第一农场渠，同步完成细腰子拜至郭家桥段裁湾9处。1954年至1959年灵武县水利局结合春修工程，裁顺了郝家桥以下24个湾道。1952年河东工程处将山水沟穿秦渠的2孔石涵洞改建成钢筋混凝土排架渡槽。1958年青铜峡水利枢纽开工，由导流明渠临时分水闸引水。1960年青铜峡枢纽截流后，从电站8号机组尾水渠引水。1969年建河东总干渠自余桥分水闸引水。1970年扩整清水沟时将原穿秦渠涵洞改建为钢筋混凝土装配式渡槽，过水流量45立方米每秒。1980年灵武县将秦渠上闸至红柳湾段向东移700米，新开渠道15.75公里。2001年秋，新建山水沟秦渠渡槽，新渡槽长72米，设计流量35立方米每秒。2000年至2015年，累计实施秦渠砌护改造25.65公里。2017年，完成秦渠郭桥分水闸自动化改造。2018年至2020年，完成秦渠郭桥分水闸以上以及农场渠91座直开口实施测控一体化改造。2023年至2024年，完成秦渠梢段砌护改造7.42公里。

之后历经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等项目实施，对渠道及配套建筑进行多次扩整和信息化改造，现干渠全长60公里，灌溉面积28万亩（含第一农场渠16万亩）。

（本报记者 **单 瑞** 整理）

古西安州张湾战斗纪事

古西安州张湾战斗遗址。

古西安州张湾战斗遗址位于海原县西安镇张湾村南。1936年10月30日，在实施海打战役计划中，红四方面军九十三师由打拉池经海原县西部树台乡灰条沟向东转移途中，在张湾村南一带与前来拦截的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发生激战。2021年10月，海原县政府对该遗址进行立碑标识。

张湾北距西安州古城15里，西夏时称南牟谷（今称园河）谷口。这里有宋夏时期的麻长台古城遗迹（后因建设张湾水库时被毁），史料记载为北宋名将张叔夜曾经屯兵之所，地势狭窄，紧扼园河河谷，为红军北进的必经之地。

1936年10月30日，为了摆脱困境，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九十三师奉命从打拉池经桥山（今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黄桥乡）向麻春堡（今海原县关桥乡麻春村）、董堡（今海原县关桥乡董堡村）一带集结。

中午，先头部队第九十三师二七四团自条子沟（今海原县树台乡条子沟村）沟口出来后，到达古西安州南的张湾（今海原县西安镇张湾村）时，与奉命在此拦截红军北上的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六师、第十师所属部队相遇，发生激烈战斗。

当时，国民党军东北军何柱国骑兵军所属骑兵第六师、第十师各一部，奉命在南面南华山脚下的锁黄川（今海原县树台乡锁黄川村）一带驻扎，拦截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因东北军之前已与西方野战军签订了互不进攻的秘密协定，他们驻扎在这里，表面上是拦截红军，摆出进攻姿态，实际上却在暗地里协助红二方面军摆脱尾追的国民党中央军嫡系胡宗南部的纠缠。

红第九十三师初来乍到，不知实情，见有国民党军拦截，就当即占据有利地形，迅速部署战斗。红军占据西面的墩墩梁，构筑炮兵阵地，居高临下，以迫击炮和重机枪远距射击，使东北军骑兵军乱作一团。红军主力利用地形掩护，以优势兵力自西向东突击敌骑兵军阵地，冲锋号吹响后，喊杀声响彻山谷，敌骑兵军无力抵挡，中枪中炮后纷纷掉入三塘梁东边的羊串子沟。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许。此时，红九十三师后续部队也相继投入战斗，从树台方向也有红二方面军总部和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北进。东北军见红军越来越多，又因骑兵马匹疲惫，不敢恋战，遂向海原方向撤退。

撤退时，东北军骑兵第六师第十六团因在右翼高山上，撤退不及，被红军包围，无法逃脱，团长董源彰及全团官兵均被俘。当时，在骑兵第六师后边一二里处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师，坐看骑兵失利不为增援，东北军官兵非常愤恨，认为其有意牺牲东北军。最后在红军四面“缴枪不杀”的震耳喊声中，十六团团长董源彰遂率部放下武器，投降红军。

这场战斗，红军共俘获东北军十六团人、马、武器各千余件。为了争取东北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遵照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红军对被俘东北军官兵以礼相待，经过教育后于次日下午5时许将被俘官兵全部释放，并归还了战马和武器。深夜12时，董源彰也被释放。董源彰被俘后，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彭德怀说：这次战斗系属误会，不知道你们是东北军，枪马一定送还。与此同时，还派2名红军战士护送他回来。但是，红军在送他往回走的途中，董源彰误入胡宗南部队的警戒线内，胡宗南部队虽未扣留董源彰，却已向张学良和白凤翔发电报，称董源彰有通共嫌疑。张学良为了不引起蒋介石的怀疑，就将董源彰押往西安，对外声称将董源彰“枪毙”了事。董源彰本为张学良心腹，还曾在西安事变中参与了抓捕蒋介石的行动。

（**据宁夏党史教育**）

为了增加老百姓幸福（下）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的政绩观

实事求是推进经济建设

边区地处黄土高原，经济十分落后，加之敌人的经济封锁，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中共中央立足实际确立了“农业第一、工业第二、商业第三”的建设方针，实事求是地发展边区经济。

在土地政策上，纲领兼顾各抗日阶层合法权益，明确在已分配土地区域保障农民土地所有权，已经分配给农民的土地，不得向农民收回；在未分配土地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推行减租减息，合理调整租佃与债务关系。1942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为减租减息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同年10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广泛发动未进行土改的地区群众，推动减租减息政策全面落地。这既改善了农民生活，又保护了地主合法权益，调节了农村生产关系，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

在农业生产上，纲领明确要求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全力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实际困难，提出当年“开荒六十万亩，增加粮食产量四十万担”的目标。同时要求动员群众时要多多给老百姓解释多种地的好处，党员干部要做模范、打先锋，要做到真正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过去我们有些地方没有真正动员老百姓多种地，只是随便造一个数目字报告上级，这是不对的，应该改正”。此后，边区大生产运动蓬勃开展，1940年到1942年，军队、机关和学校靠自己动手获得的占了经费支出的部分或大部分，有的还做到自给有余、上缴公粮，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工商业方面，纲领提出“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增强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纪律，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到1944年底，边区公营工厂达123个，私营工厂作坊达1400余家，棉布自给率约70.3%，其他日用工业品也实现了自给或半自给的要求。边区还扶持公营商业机构，鼓励私营商业发展，仅延安一地的私人商店就从1940年的46家增至1943年的473家，1944年全边区有消费合作社281个，方便了社员的交换，改善了人民生活。

财政税收方面，纲领明确废除苛捐杂税，“旧社会的苛捐杂税为的是做官的要发财，现在我们的税为的是做抗日工作”，因此推行累进税制，除特困群众免征外，实行钱多的多缴、钱少的少缴，让绝大多数人民合理负担抗日经费。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维护法币，巩固边币。1941年外援断绝后，边区政府发行边币、巩固金融、统一税制，同时通过大生产运动实现了边区财政的好转，到1944年财政收支基本平衡，1945年各县基本实现经费自给，取之于民的部分开始减少。

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

如果说发展经济解决的是眼前的吃饭问题，那么扫除文盲、发展卫生则是为边区的未来奠基。当时边区90%以上的群众不识字，扫盲艰巨而漫长。“这对于他们是很痛苦的，他们连票子都看不懂，写封信要请求人……我们为了清除老百姓这个痛苦，所以主张要消灭文盲。”纲领第十四条提出“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边区教育坚持“民办公助”方针，以群众需要和自愿参加为原则。正规教育方面，到1942年边区中学由2所增加到10所，在校学生2000多人；1944年上半年小学达1377所，在校学生约3.4万人。社会教育更是遍地开花，1937年起边区开展识字运动，利用冬学、夜校、半日校、读报、识字组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在农闲时节学习文化；到1944年，各类识字组、读报组几乎遍及各村，全边区参加冬学的农民约5万人。

卫生健康同样被摆在边区建设的重要位置，纲领第十五条要求“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指出要多办医院、制药厂、药店，培养医生，“使边区的老百姓少生病痛”。还要求干部教育群众“经常洗脸、洗澡、洗衣服，不喝冷水，不吃生东西……挖厕所，要他们把人住的地方和牲口住的地方隔得远一些”。1940年以后，边区成立了医药卫生工作管理机构，举办国医代表大会，成立国医研究会，创办白求恩护士学校等医药教育、研究机构。到1945年初，边区有医院11处、卫生所75处，西医276人、中医1074人、接生员61人，药店390家。各地还在冬学中创办妇女卫生冬学，推广新法接生，宣传妇婴保健常识。这些工作虽难以立竿见影，却从根本上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为边区长远发展积蓄了文化与人力基础。

厉行廉洁政治

纲领第八条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及其解释》中补充道，“因为共产党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应该做遵守法令的模范，如果他犯了法，就应该加重处罚，这不但不会损害共产党的威信，相反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认识共产党是最讲道理的，这就更能提高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如果政府人员有犯法的行为时，“老百姓都有权利去告发他，不管是亲自去告发也可以，写信去告发也可以，叫别人替他告发也可以”。

早在1938年，边区政府就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明确克扣截留、挪用公款、虚报冒领等10类贪污犯罪行为，规定贪污500元以上者可处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1941年，曾立战功的肖玉璧因贪污公款3000余元被依法处决，这起轰动边区的案件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员违法违纪从严惩处的坚定决心，绝不为功过相抵留任何口子。纲领颁布后，边区进一步完善干部奖惩制度，出台《边区公务员考核奖惩暂行条例》和《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1942年，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嘉奖了王震、习仲勋、马锡五等22名模范干部，毛泽东亲笔为他们题词，同时对违纪违法的腐化分子坚决予以惩戒。在纲领引领下，陕甘宁边区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被誉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据《学习时报》**）